

新正統學派——中共「建國」以來辛亥革命研究之發展及其變化(上)

李 金 強

198-203

香港浸會學院歷史系講師

辛亥革命為近代中國之頭等大事，此一革命不但使中國結束了接近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政體，並且下開民主共和之新紀元，故此一直成為世界各地史學家研究之對象，其中我國史學界對於辛亥革命研究，尤為用心，約自1902年始，相關之資料專著，論文及書目、論文索引不斷出版，數量龐大，而且從事研究之專著，不斷湧現，有增無減，由此可見此一領域，深受史學界之注目¹。

1975年美籍華裔學者謝文孫首先對於國人研究成果非出初步考查，並且將其歸結為兩大學派——正統學派(Orthodox School)及新正統學派(Neo-Orthodoxy School)；前者乃指由民國以來國民黨學者所開始之著述，並於1949年後，繼續在臺灣發展。該派學者之著述，均以孫中山締造民國及領導國民黨為中心之觀點而撰述，後者則由中共史學家所開創，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與辛亥革命史事，進行結合研究，從而提出有異於國民黨學者之新解釋。此類著述，始於二〇年代，現時則以中國大陸學者之研究為其主流²，然而踏入七〇年代，兩派學者之研究，逐漸出現變動，就臺灣之「正統學派」而言，由於受到西方中國研究之影響，已經擺脫了過去以「孫中山及國民黨」為中心的教條，其研究課題日趨「多元化」³，至於中國大陸之辛亥革命學者，亦由於1979年後開放政策之實施，不斷與外界接觸，對於「非馬克思主義」之研究成果有所瞭解，故在其原有「馬克思主義史學」之基礎上，拓展了新的研究動向，遂引起國外史學界之注意⁴。本文即以「建國」後中國大陸辛亥革命研究之發展及其變化，作為探討之對象。

新正統學派的理論及其研究

自中共於1949年「建國」以來，隨著共產主義革命在中國的勝利，由於需要營造新文化體系，藉此說明其攫取政權之合法化，並且進而鞏固其統治，而史學即為達致上述政治目的之重要學科⁵。

故此，國內史學家紛紛以馬列主義及毛澤東之「革命

」思想作為指導，從事改寫歷史，以適合新政權之需要，由此建立了當代中國史學三大主流之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此派史學之特徵，一反傳統中國史學以「聖君賢相」統治階層為中心的「人治史學」，轉而以「階級鬥爭」為綱，「人民羣眾」為目，強調造反起事的「革命史學」⁶，在此一史學風氣轉變下，近代中國革命史上首先出現的「辛亥革命」，自然成為國內學者留意的領域。

大陸中國近代史學者均以馬、列、毛理論作為指導⁷，其中毛澤東借助馬克思「階級鬥爭」及列寧對「帝國主義問題討論」作為剖析近代中國革命歷程之著述，尤為辛亥革命學者所奉為主臬⁸，故此對於「新正統學派」著述之觀點，務需掌握毛氏之「近代中國革命論」，其主要論點包括下列五方面：

其一，近代中國革命對象為帝國主義及封建主義。

其二，革命任務乃對外從事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而對內則為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

其三，革命動力以農民、工人為主體，而以民族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為最好的同盟。

其四，革命過程及性質分為兩大步驟，前後相連，第一步驟是首先改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成為民主主義社會，期間又分為舊民主主義及新民主主義兩個階段，第二步驟是使革命繼續向前發展，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按其性質前者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後者為無產階級革命。

其五，革命目的，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然後建立「人民共和國」⁹。

毛氏隨即以其「近代中國革命論」之觀點，進而解釋由孫中山所領導之革命運動，以及辛亥革命之性質和地位。他認為孫中山是較為明確地開始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舊民主主義階段，而辛亥革命則為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領導下，無產階級追隨從事革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清朝的命；可是辛亥革命並未成功，雖然推翻了清政府，但卻沒有推翻帝國主義以及封建主義的壓迫與剝削，那麼辛亥革命為什麼會有如此之失敗呢？毛氏認為其時沒有經過「一個

大的農村變動」，故此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便需要等待中國共產黨來完成¹⁰。

基於上述之分析，毛氏得出孫中山乃革命之「先行者」，而辛亥革命乃一「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斷語，而辛亥革命亦由此成為近代中國革命過程中的一部份，因而獲得肯定，並且為中國共產黨出現於現代中國歷史舞臺，以及其所策動之共產革命鋪路，並賦予「合法性」之地位。

上述毛氏對於孫中山及辛亥革命之綜述，遂成為大陸學者研究時之理論「明燈」，此即謝文孫所謂「新正統學派」之「教條」，大陸辛亥革命研究即在此一「教條」影響下，陸續出版有關之史料及論著。

中共「建國」前後，事實上已經有不少相關著述試圖利用馬克思主義研究辛亥革命，較著者如陳獨秀所發表之文章，陳伯達之「竊國大盜袁世凱」（香港：正風，1948），黎乃涵（澍）之「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政治」（北京人民，1954），胡縱的「孫中山奮鬥小史」（香港海洋，1947），以及陳旭麓的「辛亥革命」（上海，人民，1955）等，後者為中共「建國」後第一本辛亥革命通論著述¹¹，其後又在黨政領袖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個別鼓勵下，辛亥革命研究由是勃興¹²，於1956至57年間，相繼出版一系列資料等，如「孫中山選集」、「民報」，及「辛亥革命」（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合共八冊），後書尤為重要，刺激大陸學者對辛亥革命研究之興趣。

1961年由於慶祝辛亥革命五十週年，遂出現了國內辛亥革命研究之第一次高潮，湧現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以吳玉章（1878-1966）出版之「辛亥革命」（1961）一書及同年武漢召開紀念辛亥革命五十週年討論會之「論文集」（1962），最受注目。兩書實為馬列毛理論與辛亥革命史實結合之研究成果，對於日後辛亥革命研究影響甚大¹³。吳玉章曾經參與辛亥革命，1949年後出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1961年在毛澤東鼓勵下出版「辛亥革命」一書，該書包括「論辛亥革命」及「從甲午戰爭前後到辛亥革命前後的回憶」兩部份，其中前半部「論辛亥革命」，乃以毛澤東之「近代中國革命論」與辛亥革命史實相結合的著述，難怪毛氏譽該書為對「辛亥革命作了馬克思的分析」¹⁴，該書此後成為「新正統學派」的典範著述，國內辛亥革命學者大多受其啟迪¹⁵。至於「辛亥革命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收錄卅篇屬於基礎研究之專題論文，撰寫者現時多為國內辛亥革命研究的著名學者，如章開沅，胡繩武、金沖及，陳旭麓、張磊、吳雁南等。中國大陸之辛亥革命研究，由是奠下基礎、有路可循，得以進一步發展，自成學派，計自「建國」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據章開沅之不完全估

計，先後出版書籍50餘種，資料30餘種，論文500餘篇，其研究課題主要包括下列數方面。

其一，以「階級鬥爭」理論為線索，研究清末社會矛盾之激化，從而說明辛亥革命之發生。

其二，強調「人民羣眾」為辛亥革命之根本動力，大量發掘及整理各地民變資料（為上述「辛亥革命」之第三冊），研究工、農民變，以至新軍會黨和華僑等參與革命之專題。

其三，以階級分析，進行研究孫中山及其領導之同盟會，並開始注意其它革命領袖、派系與團體之研究。

其四，注意經濟背景與階級關係之探討，開拓民族資產階級的研究課題。

其五，以反帝、反封建觀點，研究帝國主義侵華史實，及其所支持之清政府，以及袁世凱等「反革命」之嚴重罪行¹⁶。綜上可見，新正統學派之研究與毛氏所論相符。

然而，中共之革命雖已成功，其黨內之派系衝突則方興未艾，由於毛澤東深感黨和政權都發生變質，出現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以及人民羣眾與官僚主義作風的矛盾，毛氏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及修正主義復辟與蔓延，認為有必要「繼續革命」，終於展開了「滅資興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¹⁷，遂產生「文革十年」之動亂及「四人幫」之橫行，極左思潮流行，史學研究淪為政治工具，此即「史為幫用」之「影射史學」，其時史學家與史學研究之客觀性，大受蹂躪¹⁸，正如中共名史學家黎澍的沉痛反思：「歷史學也隨之愈加脫離事實，被簡單歸結為替領袖言論，以及被他們曲解的幾條馬列論述作注解，變成了舊經學相類似的新經學」¹⁹，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所強調的科學性研究，顯成「畫餅」，難以實現。

就辛亥革命研究領域而言，也在打倒「走資派」的政治口號下，強調中國近代史的動力來自農民運動，因而突出和肯定「太平天國」及「義和團」兩次革命高潮，對於統治階層之改良運動，如「洋務運動」及「維新運動」均採否定，從而波及辛亥革命之研究²⁰。「四人幫」以「立足於批」的基調，對於中共「建國」以來辛亥革命為資產階級領導革命之理論，則指斥為資產階級「中心論」、「高明論」、「決定論」，重加批判，否定辛亥革命時所建立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歷史意義，並將辛亥革命納入「儒法鬥爭」的解釋體系，因而辛亥革命被視為「四舊」，孫中山被罵為「牛鬼蛇神」，相反地，被標貼為「反儒尊法」的章炳麟則受到推舉，對於辛亥革命領袖，採取揚「章」（炳麟）抑「孫」（中山）之手法；其它革命領袖如黃興、宋教仁，則劃入「宗派主義」和「右派」行列，而立憲派則被指控為反革命之修正主義，辛亥革命研究由是無從

發展²¹。據遼耀東的觀察，文革十年間（1966—76）的論文不超過廿篇，皆為工農兵所撰寫，主要為了配合「儒法鬥爭」的解釋體系，毫無學術價值可言²²。

綜上所述，可見中共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在毛澤東革命與建國理論，以及黨內派系衝突之政治鬥爭影響下，革命意識形態與行為，始終躍動於建國後的國家與社會當中，故辛亥革命研究，在此一「政治」與「革命」掛帥之時代背景下，革命份子與團體，人民羣眾反清、反帝之鬥爭遂成為寫史的對象，而一般著述均瀰漫著「革命」與「反革命」，「進步」與「反動」，「愛國」與「賣國」等字眼，「革命史學」的烙印，至為明顯；然而，隨著1976年，「四人幫」的下臺，辛亥革命之研究，亦由於政治局勢的轉變，終於出現了新的契機。

辛亥革命研究復興與拓新之原因

打倒「四人幫」後，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確立了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思想路線，以及停止階級鬥爭，開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政治路線²³對外開放，務求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²⁴，並以發展經濟與統一港、臺為其目標，在此一政治局面好轉的情況下，遂為史學界帶來了新的契機和變化。

其一，史學研究由前此為「革命」與「政治鬥爭」服務轉而為建設「四個現代化」及實現「祖國統一」而努力，史學家情懷雖已琵琶別抱，然史學與政治之密切結合、顯無二致²⁵。

其二，在對「文革史學」批判之過程中，一方面回顧「建國」以來馬克思主義開發史學園地筚路藍縷之勞，另一方面則總結傳統史學，以及吸納國外史學，在學術層面上進行了反思，香港史學家許冠三稱其時之史學研究為「正在尋求自我的本土史學」²⁶，允稱恰當，國內史學家謀求學術化與獨立化，至為明顯。

隨著史學工作者的努力研究和出版，終於出現文革後的「春回大地、鶯歌燕舞」的「新時期史學」，史學在更新和開拓中前進²⁷，而辛亥革命研究亦由於「研究工作者恢復和發揚了實事求是的優良學風，不斷突破禁區，擴展新的領域」²⁸，出現了勃蓬景象，論者以為自1979年至1989年間，實為國內辛亥革命研究之「黃金十年」²⁹，從而產生了新的研究動向。

辛亥革命研究之所以起復和出現新變化，除了上述國家層面之政局改變及新政策實施此一因素外，更與下列四方面之學術背景具有密切關係。

（一）研究方向之反思——1976年「四人幫」下臺後，中

國大陸史學界全面反省文革時期，史學研究淪為政治工具的痛楚，特別對於「儒法鬥爭體系」蹂躪史學之客觀性，作出沉痛檢討³⁰。而辛亥革命研究領域亦同時進行反思，包括樊百川、李潤蒼及章開沅等，對四人幫之辛亥革命研究進行批揭³¹。其中以章開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一文最為重要，章氏除了要求肅清「四人幫」極左路線在這領域之流毒外，並進而提出三點研究之建議，（1）正確地，全面地評價處於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2）人物評價不宜以好壞分類來武斷，必須還歷史以本來面目；（3）中外關係問題上，要把帝國主義與人民區別開來，闡明世界人民對於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同情和支援，進而呼籲辛亥革命研究同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³²。章氏一文之觀點，被視為「撥亂反正」之代表作³³，上述辛亥革命研究學者之反省，成為國內同行之共識，紛紛努力研究及出版，終於使辛亥革命研究此一範疇獲得了延續與更新的發展。

（二）學術團體之成立——國內辛亥革命研究學者主要集中於北京、上海、武漢及廣州四地之研究機關及大專院校。其中以廣州、武漢兩地最為重要³⁴，廣州之中山大學及廣東社會科學院分別設有「孫中山研究室」及「研究所」，負責推動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之研究工作，著名學者甚多，如陳錫祺、張磊等人，並且成立「孫中山研究會」，出版「通訊」及「孫中山研究論叢」，促進此一範疇之學術研究與交流³⁵。至於武漢則以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系最為重要，附設「辛亥革命史研究室」，並且培訓辛亥革命史之研究生，該系教授章開沅為此一階段國內辛亥革命研究之代表學者。章氏於1954年，開始從事辛亥革命研究並以資產階級此一課題研究重點，同時注意研究廿世紀初的社會進步思潮，著述甚豐，為1981年與林增平分編「辛亥革命史」三冊，被譽為「解放以來最大成果」，深受中外史學家所重視³⁶。

1978年，章氏聯同林增平（湖南師大），及張磊（廈門社科院）發起成立「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研究會」，翌年成事。為現時辛亥革命研究最重要的學術團體，該會除了參與籌劃國內歷年所舉辦有關孫中山及辛亥革命之國際研討會外；並先後出版「辛亥革命史叢刊」（已出版七期），「辛亥革命史研究會通訊」（已出版卅三期），以及「國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動態」（已出版七期）。上述刊物，刊登有關辛亥革命研究專題論文，史料書目、論文索引，國內外研究動態，以及譯介國外學者之研究成果³⁷，從而使國內學者不但得以彼此交流研究心得，並且瞭解國外學者之研究方法與觀點，在「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啟迪下，遂刺激國內辛亥革命研究方向之變動³⁸。由此可見該會對於

1979年後國內辛亥革命研究之推動，貢獻至大。

(三)國內外研討會之召開與出席——自1979年以後，國內接二連三召開辛亥革命與孫中山之學術討論會議，其中以1979年廣州舉行的「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學術討論」(11月19至28日)及1981年在武漢舉行的「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學術討論會」最為重要。前者中外學者出席達141人，提交論文84篇，全會首先批判四人幫在孫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上散佈極左思潮之錯誤，同時提交了不少嶄新課題之論文，最後更由港、美、日三位學者報告國外研究動態。此一會議不但顯示中國大陸學者對辛亥革命之歷史地位再肯定，同時意味著辛亥革命學術研究之再發展，並且帶動了日後研究之新動向，難怪章開沅譽之為「春天飛來的第一隻燕子」，後者則包括中國學者181人，外國學者40人，會議以「辛亥革命之資產階級」為主題，並於會後出版「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三巨冊，是為八〇年代初期有關辛亥革命國際研討會中最大規模者，大陸學者與國外學者包括來自港、日、北韓、澳、美、加、法等地，首次獲得機會互相展示各自之研究成果，促進大陸辛亥革命學者與外界之交流。而西方學者對於「資產階級革命論」之相左意見，亦為國內學者明悉³⁹。

其次，隨著中國開放政策之實施，大陸學者開始出外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1982年美國亞洲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在芝加哥召開年會，並舉辦「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創建」之國際性與多邊性討論會。海峽兩岸九位近代史學者應邀出席，此乃自1949年後，中、臺學者首次在國際學術會議中之歷史性會晤，備受中外學術界所注目，會議中，兩岸辛亥革命研究之代表學者章開沅及張玉法(中研院近史所前任所長)就辛亥革命性質發生了著名的「張、章論戰」，使會議進入高潮、最為矚目，該論戰主要由章氏提出辛亥革命乃屬「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說法，藉以回應張氏所主張之「全民革命論」，各持所見，由是爭議，然就學術而言，此一論戰本質實為「馬克思主義史學」與「西方中國史學」不同觀點之論戰⁴⁰，難有結果。章氏稍後又發表「就辛亥革命性質問題答臺北學者」一文，然未見張氏回應，論戰由是沉寂⁴¹。

上述一連串國內外學術性會議之召開，除了使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研究範圍不斷湧現出新成果外；更使大陸學者必須面對「非馬克思主義」之研究觀點，由此引起「辛亥革命本質」之爭議，前述「張章論戰」即為其中較著者而已⁴²，並且導致日後「新正統學派」之「教條」和研究課題，相應地有所「更動」。

(四)國外研究成果之引介——由於上列之學術活動，使大陸學者得與來自「資本主義社會」的臺灣、香港、日本

、英、美、法、德、澳洲等地學者，互相會晤與交流。除了陸續接觸到臺灣地區辛亥革命研究之中文著述及有關史料⁴³，並且開始注意各地學者的英、日著述進而譯介有關之專著、論文及研究述評；現時已經出版的專著，包括有薛君度之「黃興與中國革命(1980)」Joseph Esherick之「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1981)Harold Schiffrin之「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1981)，John Reid之「清帝遜位與列強」(1982)，Martin Bernal之「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1985)等書。

至於專題論文及研究述評，主要透過上述「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辛亥革命研究叢刊」，「辛亥革命史研究會通訊」及「國外辛亥革命研究動態」等刊物之譯介，其中「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之第二輯，為辛亥革命七十週年紀念專輯，內譯日、美、蘇、澳洲學者論文十二篇，而以Joseph Esherick及石田米子關於西方及日本辛亥革命研究述評最為重要，其餘「辛亥革命研究叢刊」及「國外辛亥革命研究動態」兩刊譯文最多，包括臺灣學者論文1，日本學者⁴⁹，南韓學者1，美國學者14，英國學者1，法國學者1，澳洲華裔學者1，合計68人⁴⁴，由此可見，日本學者之研究，深受國內關注，究其原因，該國學者之主流觀點亦主「資產階級革命論」，彼此觀點相近不無關係⁴⁵。而「辛亥革命史研究會通訊」，亦間有譯著，舉例而言，其中第九期(1981)，李榮昌譯Stuart R. Scharm對西方「修正學派」Revisionist School重要著作，包括Mary C. Wright編著*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90-1913*一書以及其它相關書籍之評述，甚具意義。

綜觀上述國外研究成果，除日本、蘇聯之研究觀點，與中國同受馬、列、毛影響，較為接近外；其餘觀點相左之臺灣及美國兩地，其成果均能自成體系，因而吸引國內學者之注意與興趣⁴⁶。臺灣之研究，自1949年後在「西方中國學」成果之影響下，已經逐漸擺脫「正統學派」之教條，其中以立憲派與辛亥革命之研究，以及「全民革命論」之提出，最為重要，代表性學者為張朋園及張玉法。至於美國，則以六、七十年代崛起之「修正學派」為其主流，由薛君度，Mary C. Wright首開其先，至 Joseph Esherick，其理論日漸完備。該派研究課題與觀點，主要分為三方面：其一，貶抑孫中山與同盟會之領導地位，認為革命運動重心在於國內，故對省區研究尤為着重；其二，重視革命之社會情勢(Social Situation)，故對晚清十年(1901-11)新政與革命之研究最為關注，並且得出新政導致革命的論點，其三，認為革命發生來自統治階層之向背，故大多注意士紳或精英(elite)與革命關係之探討，從而提出「士紳或精英之運動論」⁴⁷。隨著大陸新舊代學者

，對於臺、美學者研究課題與觀點之不斷接觸，其研究視野與方法由是得以開拓。

大陸學者即在政局改觀、學術開放與交流之背景下，一方面對「文革」之研究觀點作出批判與修正，重拾五、六十年代開國元勳如毛澤東等對於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之肯定觀點以及強調「資產階級革命論」之成說，建國初期毛氏之「辛亥革命論」由是得以「重生」。並且進而批判國外學者與此相異之觀點，因而產生「辛亥革命本質」之論戰；另一方面則在國外研究，如臺灣及美國學者之成果影響下，開始嚐試探討「新正統學派」以外之新課題。故此1979年後中國大陸之辛亥革命研究，即在「繼往」與「迎新」兩股動力交相衝擊下，逐漸湧現出研究之新動向。

註釋

1. 李金強：「辛亥革命的研究」，「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89），下冊，頁751-809。
2. Winston Hsieh, *China Historiograph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5), pp.5-13.
3. 李金強，同註1，771-790。
4. Michael Gasster: "Recent Studies of the 1911 Revolution by Historia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vol. XVII, No.2 (1983-84), pp.30-41。
中村義：「日本『辛亥革命研究』會刊發刊辭」，辛亥革命史研究會通訊，9期（1981），頁27。
5. 姚蒙：「建立一種批判的大革命史學——訪法國著名史學家弗朗索·瓦孚雷」，史學理論，4期（1989），頁80。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史學評論，1期（1979），頁5-6。
6. 唐德剛：「當代中國史學的三大主流」，傳記文學，51卷4期（1986），頁26-27，又氏著：「論中國大陸落後問題底秦漢根源」，傳記文學，52卷2期（1988），頁31-32。其餘兩大主流分別為「中國傳統史學」及「現代西方中國史學」，又黎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學」，再思集（北京：中國紀念科學，1985）頁223，頁230-231。
7. 關於馬、列、毛對近代中國史及辛亥革命之觀點，詳參林增平等編：中國近代史研究入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頁14-43。
8. 尹達：中國史學發展史（河南：中州出版社，1985），頁539-546。尹氏認為毛澤東思想在抗戰時期，已經逐步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提供銳利的思想武器，又逄耀東：「對中共『歷史解釋』的分析」，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臺北：時報文化，民68），頁63，逄氏認為自1957卸權，毛澤東思想對於中國大陸史學起指導性作用。又陳旭麓：「辛亥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

——學習毛澤東同志論述辛亥革命的筆記，解放日報（上海），1961年10月6日，第四版。

9. 毛澤東：「青年運動的方向」（1939）；「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新民主主義論」（1940）；均載於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77），第二卷，頁526-527，596-611，626-627。
10. 毛澤東：「青年運動的方向」，同前註頁526-529。又「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唯心歷史觀的破產」，同前註，第四卷，頁1368-1369、1400、1402、「紀念孫中山先生」同前註，頁311；「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同前註，第一卷，頁16。又陳旭麓，同註8。
11. Winston Hsieh, op. cit. pp.41-50，參「陳旭麓教授生平」，辛亥研究會通訊33期（1989），頁34。
12. Zhang Kaiyuan: "A General Review of Me Study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AS*, vol. 34, No.3 (1980), pp.525-526。
13. 劉望齡等：「辛亥革命研究述略」，中國近代史專題研究述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298-299。
14. 胡華：「吳老（玉章）百歲祭」，胡華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88），頁24。胡華等：「吳玉章」，1979年中國歷史學年鑑（香港：三聯，1981），頁311-314。
15. 陳旭麓：「評吳玉章同志的『辛亥革命』」，及「一本關於辛亥革命的新著」，均載於陳旭麓學術文存，（上海：人民，1990），頁562-571。又張其光：「學習吳玉章同志的『辛亥革命』」，史論存稿（廣東：人民，1956），頁130-133。
16. 章開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三十年」，載於劉望齡：辛亥革命大事錄，（上海：智識，1981），頁109-110，Winston Hsieh, op. cit. pp.41-63. Edmund S. K. Fung: "Post-1949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1911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4:2 (1978), pp.181-206.
17. 蕭延中：「劃時代悲劇的剖析與理解——對毛澤東晚年政治哲學思考的若干思考」，晚年毛澤東（北京，春秋出湖北，1989），頁68-71。吳安家：「試釋中共所謂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中共史學批判論集（臺北：幼獅，1979），頁350-352。
18. 逄耀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風暴中的史學與史學家」，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臺北：時報文化，1979），頁71-107。周朝民等編：中國史學四十年。（南寧：廣西人民，1989），頁265-355。
19. 黎澍：「一九七九年的中國歷史學」，同註6，頁123。
20. 左肯青、章鳴九：「評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歷史研究，12期（1979），頁7-10。
21. 章開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幾個問題」，華中師院學報，1期（1979），頁57-58，並參Zhang Kaiyuan, op. cit. p.526。

22. 遼耀東：「辛亥革命七十年」，史學危機的呼聲（臺北：聯經，1987），頁187。又參林增平、郭漢民等編「辛亥革命」，（成都：巴蜀書社，1989），頁600-602。內刊文革時期之報刊雜誌論文目錄合計36篇。
23. 朱建華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哈爾濱：黑龍江人民，1989），頁596-598。
24.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香港：三聯，1985），頁31-35。
25. Eto Shinkichi & Harold Z. Schiffman (eds.):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Interpretive Essays"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4), pp.xiii-xiv.
26. 許冠三：就史學九十年，1900-，（香港：中文大學，1988），下冊，頁275-281。並參趙吉惠：「十年史學思想轉換的反省」，新歷史研究，1期（1991），頁152-160。該文指出近十多年來中國史學界已經開始總結及吸取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史學及西方史學。並且進行全面反思，漸漸形成一多元結構的史學方法體系。
27. 王玉德、姚偉鈞編：新時期中國史研究爭鳴集（武漢：華中師大，1988），頁1-4；「歷史研究」編輯部：建國以來史學理論問題討論舉要（濟南：齊魯書社，1983），頁1-6。又參李侃：「在更新和開拓中前進——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現狀和發展趨勢」，明報月刊，5月號（1987），頁77-82。
28. 林增平等編：中國近代史研究入門，同註7，頁470。
29. 羅福惠：「辛亥革命研究四十年」歷史教學3期（1990）頁44。
30. 黎澍：再思集，同註6，參閱黎澍對於四人幫批評之各篇文章。又參遼耀東：「儒法鬥爭解釋體系的形成與批判」，同註22，頁38-68。
31. 郭漢民、李育民：「辛亥革命史研究概述」，載於林增平等編：「辛亥革命」，同註22，頁12-13。
32. 章開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幾個問題」，同註21，頁57-63，章氏稍後將此文補充寫成「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史叢刊，第一輯（1980），頁1-24。
33. 林增平：「辛亥革命史研究述評」，1979年，中國歷史學年鑑，頁176。
34. Zhang Kai yuan, op. cit., pp.526-527.
35. 「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文件」，孫中山研究，第一輯（1986），頁403-405。
36. 哈經雄：「一塊鋪路的石子——知名歷史學家章開沅」，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4期（1986），頁47-53。
37. 「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研究理事會第四屆理事會議紀要」，辛亥革命史研究會通訊，31期（1988），頁1-4。
38. 聞滔：「具有特色和深受歡迎的『辛亥革命史叢刊』問世」，華中師院學報，3期（1981年），頁118-120。
39. 李金強，同註1，頁766-768。章開沅：「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學術討論會國內論文述評」，辛亥革命史研究會通訊，9期（1981），頁4。狹間直樹：「關於武漢學術討論會的外國學者論文」，國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動態，4輯（1985），頁1-16。後文記中外學者關於辛亥革命性質之討論甚詳。
40. Lee Kam-keung, "A Brief Report on Conferences on China's 1911 Revolution — Two Important Issues 1961-1982"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of Hong Kong, 1987), pp.14-15, 28-34; 又參李惠英「兩岸學者同堂討論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史研究會通訊，12期（1982），張忠棟：「參加辛亥革命討論會的始末」，近代中國，28期（1982），頁56-62，唐德剛，同註6，頁25-28。
41. 章開沅，「就辛亥革命性質問題答臺北學者」，近代史研究，1期（1983年），頁163-191。
42. 關於「辛亥革命本質」此一課題，主要包括兩方面，其一，辛亥革命是否一個革命？其二，辛亥革命是否資產階級革命，其中日本學者橫山英及法國學者Marie-claire Bergère之論點，最能引起大陸學者之關注。劉大年、李時岳，先後為文反駁，而以正文中之「張、章論戰」則最具代表，章開沅反駁最力。參Lee Kam-Kaung, op. cit., pp.28-34。章開沅：「就辛亥革命性質問題答臺北學者」，同前註；劉大年：「論辛亥革命的本質」，赤門談史錄（北京：人民，1981），頁22-121。又參李時岳：「近代中國社會的演化和辛亥革命」，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華，1983），上冊，頁171-183。
43. 郭興仁編：「1979年以來臺灣有關辛亥革命論著資料索引」，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18輯（1991），頁304-332。
44. 「研究叢刊」與「研究動態」兩刊，均已出版七輯，後者二至七輯，由中山大學教授桑兵所贈，謹此致謝，文中統計以此兩刊十三輯為主。
45. 久保田文次：「辛亥革命史研究概況」，載於山根幸夫編：中國史研究入門（東京：山川出版社，1983），下冊，頁305-310。中譯載於「國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動態」，第四輯（1985），頁28-32。指出日本學者師承「資產階級革命論」之路向，而解釋稍異。
46. Winston Hsieh: At the Threshold of a New Era, *Chinese Republican Studies Newsletter*, vol.8, No.2 (1983), p.3.
47. 李金強，同註1，頁776-790，796-799。Edmund S. K. Fung: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3-4.